

晚清—五四语境中学科建制的确立 与中国文论话语的知识转型

晏 红

在晚清—五四时期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自足系统的崩溃与瓦解，不仅表现在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经学话语的转型，而且体现为西学知识谱系对传统中学的切换。当然，这种切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相当漫长、逐步演变的过程。如果说晚清—五四时期从“家国天下”到“民族国家”再到“个体自我”的意识转换，主要体现为在西方“他者（the other）”参照下的源于自我的现代性主体认同，那么有关中西知识谱系的切换则在此基础上，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重组与西学话语的输入，直接在知识转型层面开启了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话语模式与意义建构。

晚清—五四时期开始的学科建制，究其实质，是现代性三大层面之一“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的体现^①。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20世纪末学界在进行现代性问题讨论时，有关学科问题的不断反思其实并非偶然，其中固然不乏世纪末学术清理的趋势使然，但亦不乏由此出发对其知识谱系的学科依据的现代性追问^②。在种种反思中，尽管中国现代学科的学术史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但是对这种学科建制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生成的重要意义则分析不够，尤其是对现代学科建制兴起的历史文化语境及其

① 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② 《文学遗产》编辑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编《百年学科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可以说是有关学科问题反思的集中体现。另参杜书瀛、钱竞：《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孟繁华：《激进时代的大学文艺学教育（1949-1978）》，《文学前沿》第2辑；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2001中国年度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带来的知识学层面的影响相对缺乏应有的探讨。其实，中国文论话语由经学意识到美学意识、由广文学向狭文学的转换，最终正是随着晚清开始的学科建制的逐步确立与发展，才得以完成的。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与辨析，从而厘清晚清—五四语境中学科建制的确立对于中国文论话语的知识转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

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学话语的解体，意味着维系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系统的崩溃，自然也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重组，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知识系统迥异的新的知识体系必然会在这种崩溃过程中得到重新的建构。与中国整体的现代性追求一样，这种建构仍然是以西方“他者（the other）”为参照的。因此，作为与中国文论话语知识转型相关的现代学科建制也必然与西学在中国的输入与影响密切相关。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晚清—五四时期学科建制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急速增长的异域新知的冲击下，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异，从而在思想观念和文化教育制度层面引发的学术知识的现代转型。

具体而言，异域新知的急速增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一是介绍西学的书籍和报刊越来越多。需要说明的是，晚清时期对西学的介绍与输入主要还是通过西方传教士的译介来进行的，如美国教会设立的美华书馆陆续出版了一些介绍西洋新知的书，如《地理全志》、《格致质学》等；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 H. Medhurst）等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从19世纪50年代起出版了很多西学书；1864年丁韪良（W. A. P. Martin）翻译《万国公法》（即Henry Wheaton的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更是得到官方的支持，被认为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相当重要的事件。二是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开始目睹西洋文明并了解西洋新学。尽管此时中国传统之“士”们对西学中蕴含的与中国传统文化迥异的文化特征的认知大多是一种“附会”，却不能不对西学的异质性开始重视，并受到其潜移默化的影响^②。

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最终在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方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两种影响：一是它意味着在西学的知识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在西学的冲击中，不仅整个文化思想观念被动摇，而且这种动摇在很大程度上

^① 详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8-609页。本文有关史实未特别注明者，均参考此书。

^② 有关这种认知的附会性特征，萧功秦有较为详尽的论述。详见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体现为原有知识分类的解体；二是在西学东渐中，作为知识主体的中国文人的知识结构也发生了迥异于传统的变异，而这对新的文论话语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有论者在对中国现代文论话语主体的知识结构进行分析时，便以“中学、西学与东学”加以分类，认为“现代汉语诗学的第一代话语主体，即鲁迅、胡适一代具有很高的中学修养。他们的启蒙教育，基本上仍是传统的，或者说是旧式的。当1905年，因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等联名上奏，清政府完全废除科举制度时，鲁迅、陈独秀、周作人、钱玄同甚至胡适，都已经打下了比较深厚的中学功底。……但从张之洞《劝学篇》‘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的表述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在时代的潜意识里‘中学’已经过时，西学则风头正劲”^①。

对此，当今学界论述众多。其中，罗志田对中国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代表此类研究。他认为，在当时，“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新即是善，旧即是恶；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②。需要指出的是，异域新知传入中国的过程，也是西洋器物及各种西洋风气传入中国，并直接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过程。如果说1844年徐继畲在福州重建鼓楼时安装西洋大自鸣钟，还让人们大为好奇，那么到19世纪60年代，从租界开始，邮政、保险业务开始创办，西洋的印刷机、缝纫机、照相术、博物馆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此后的70年代到80年代，各种西学知识和器物大量进入中国，电报、电话、电灯、火柴、自来水、铁钉渐渐成了中国人特别是沿海地区人们常见的日常生活物品。19世纪80年代创刊并影响很大的《点石斋画报》对当时的这种生活状态有着非常形象而真实的介绍，我们可以在该画报上看到各种西洋人、西洋物品、西洋习惯和西洋知识，而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密不可分的内容。

可以说，所谓西学东渐，既是西学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疾风骤雨”般的冲击，也体现在西洋器物及西洋风气对人们日常生活“和风细雨”似的渗透。正是从人们日常生活中日常用品的改变开始，来自西方的一切逐渐影响到人们的思维习惯和思想观念。这其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中国文化的现世性特征注定了在中国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的根本改变，都必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发展流变，之所以经学话语成为其内在的精神支撑，根本原因就在于经学话语就其实质而言与中国几千年来生活方式有着一种内在的一

① 向天渊：《现代汉语诗学话语（1917-1937）》，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11页。

②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致性。只要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发生改变，那么经学话语的精神本质就不会发生改变。换言之，只要这种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异，那么作为这种生活方式精神支撑的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因其对生活本身言说的失效而走向瓦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所以对有关生活礼仪特别注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形式”恰恰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支撑与规范。因此，所谓“中西知识谱系的全面替换”，就只能在与人们的生存状况最为切近的日常生活语境中，通过西学知识的日渐渗透，逐渐得以完成。如“气”与“阴阳五行”之思想观念，本来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具有形而上的价值意义，然而在强大的西学知识面前，它们便不得不失去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形而上意义，而向西方科学认同。“例如关于地壳也已经不再仅仅比附五行而是接受了西洋人的说法，关于大气的认识也改变了过去只是用阴阳解释的思路而接受了西洋人关于大气分析的结果……关于人自身，他们也不再坚持传统中国关于‘心之官则思’的说法，郭嵩焘和薛福成都大体上接受了西洋关于人的思考由于大脑，心脏主管血液流通的生理学知识……”当然，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郭嵩焘还相信由于人的潜力、兴趣、命运不同，头颅外形也不同，把它与颅相学连在一道，而薛福成则希望调停二者的差异，所以说‘悟性在心，记性在脑’，‘心与脑者，皆人身之主宰也’”^①。

另外，晚清出现的大量介绍西方知识的辞书，使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许多事物与现象在与西学的切换中，重新得到了解说，而这种解说无疑为中西知识谱系的全面切换奠定了基础。即如上述有关“心”的概念在西学背景下的观念转换，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现代转换中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心”可谓一个核心，甚至有学者直接将中国文学界定为“心学”，将中国文化界定为一种“心性”文化^②。

二

当然，上述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自西学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观念无形的消解，真正将中西知识谱系的切换推向全面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知识最后崩溃和瓦解标志的，是代表西学知识的学科建制的确立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教育体制的引入。因为传统中国知识系统与西学大相径庭，它是以经学为中心，以理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2页。

^② 钱穆：《略论中国文学》，《国学大师论国学》，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页。

解和揣摩圣贤与经典的真理为途径，以培养自觉的道德修养为目的，具有一整套独特的自我阐释与言说的话语模式和意义建构，而西方的知识却不同。当西方进入近代以来，知识渐渐学科制度化并开始有了清楚的门类区分，呈现为一个界限分明的现代学科分类表规定的知识谱系。其实，早在明末，“艾儒略在《西学凡略》中就告诉中国人，‘报西诸国，总名欧罗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就是文（勒铎理加）、理（斐禄所费亚）、医（默第济纳）、法（勒义斯）、教（加诺搦斯）、道（陡禄日亚），而这六科与中国的经史子集知识世界是格格不入的，简单的类比和移植就仿佛方枘圆凿，任何截长补短都是徒劳”^①。尽管如此，方枘圆凿式的替换与切割（知识分类）却在“崇西”浪潮中势不可挡地全面展开，尤其是19世纪末开始的学科建制与教育体制的确立，更是将其推向高峰，从而为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型奠定了知识学的基础。

在传统的“文”或“文学”观念中，文之基本精神是体现于经学意识中的，因此，一般而言，传统书院里只有经学课程，而无专门的文学课程。据有关资料^②显示，清代只有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创办的学海堂（广州）讲授过《文选》、《杜诗》和《昌黎集》，其他的学堂、书院在文科教学方面，仍是传统经学教育。但是，随着西学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突出，这种状态在19世纪末被完全改变，以西方“他者（the other）”为参照的新的学科建制开始创建。

1898年5月，在康有为的奏请之下，光绪皇帝向全国下令：“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指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③

尽管在朝廷的支持下，明令改中国传统书院为新学堂是在1898年，但相关影响却可回溯到19世纪中叶。从19世纪40年代起，各种外国教会学校开始在中国建立，异域新知得以广泛传播，如1874年由中外人士联合创办的格致书院，就很明确地要求教授西学知识。《拟创始格致书院事》表明，书院“欲以西学训导华人”，它象征“中国西学之将大盛”。格致书院的章程中明确指出，要轮流由“精晓艺术”的院师来讲格致的内容，而这种格致的内容分“天文、算法、制造、舆图、化学、地质等等”，这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5-606页。

^②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③ 汤志钧、陈祖思：《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6页。

与中国传统知识的学科分类已迥然不同。稍后由林乐知等人于1881年创立的中西书院亦如此。《万国公报》1881年11月26日刊登了《中西书院课程规条》中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已经改变了传统中国书院或学校的知识分类,采用了西洋方式,1884年建成的五个馆分别是中学、西学、算学、贸易、格致。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设后,官方的学校也渐渐改变了其知识格局,天文算学开始进入官方学校体制。特别是1888年科举首开算学科,更预示着传统中国知识系统的瓦解。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同治六年(1867),张盛藻、倭仁等就从“立国之本”的角度,对同文馆设天文算学提出过激烈批评。从这种激烈批评中,其实可以体会到知识系统的这种变化对于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

尽管如此,可以确定的是,传统知识系统的更新在晚清西学冲击下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而教育无疑是关键途径,由是,教育观念的改变不可避免,而这势必影响此后知识系统和思想观念的改变,对中国文论话语亦然。1881年出版的《花图新报》第十卷中一篇名为《变通学校论》的文章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一种思想潮流。该文一面说教育,一面说国际形势,不仅特别强调思想观念的重要性,而且具体介绍西洋学科分类的制度,指出大学分成四门,而小学则学习“天文地理格致化学”,并引用日本的例子说,日本已经“建大学院八,小学院三十二……我中土曷不仿而行之”。对此,有论者明确指出“由于为了应对时局,追求实效,当它不再把修养和道德作为教育中心,而把类似西洋的科学技术作为中心,开始仿效西洋知识教育的方式,这里直接带来的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后果之一,却是传统知识系统的最后崩溃和瓦解”^①。这种影响在以经学为支撑的中国传统文论那里更是显露无遗。

虽然1898年京师大学堂便宣布成立,但还不能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其课程设置依然延续传统,以经学为核心,其教育模式仍是传统的书院教育。直到1902年,朝廷相继颁布一系列章程,现代学科建制才真正得以开始。在《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虽没有专门的“文学科”,但实际讲授的内容已经由经学转向“词章学”。1903年,在《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中国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设置。同年,外国文学与相关的“文学理论”也开始进入具体学科建制中。在当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便明确规定,文学科大学分设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和日本国文学门。尤其是在中国文学门中,开设了“文学研究法”和“古人论文要言”两门课程。前者内容庞杂,涉及文体、文法、风格以及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文学与地理之关系和文学与道德之关系等。后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5页。

者涉及《文心雕龙》等内容,可以说是现代学科体制中“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的滥觞。1906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中针对张之洞不设哲学学科的四条理由逐一进行批驳,不仅强调了设立哲学学科的必要性,而且还以欧洲文科大学和日本文科大学的学科设置为参照,明确提出自己对于大学文科学科建制的基本观点,即“由余之意则可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中,而定文学科大学之各科为五:一、经学科;二、理学科;三、史学科;四、中国文学科;五、外国文学科”,并具体拟定每一学科的课程设置,除史学科外,均强调对于哲学概论和美学科目的设置^①。

1912年,刚成立的民国政府颁布《大学令》,明确提出以专业化教育和培养专才为大学宗旨,现代的教育制度得以确立。京师大学堂亦正式易名为北京大学,其文学门中也增设了哲学概论、美学概论、伦理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希腊罗马文学史、近时欧洲文学史等现代课程。与此同时,在文学门的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和言语学类等,均设置了文学概论课程,这是文学概论科目第一次出现^②。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文学类当时还只是开设“文学研究法”,直到1917年才开设了“文学概论”。由于文学概论是从国外新引进的课程,所以师资奇缺,就连北京大学都找不到专任教师^③。由此正可见出,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不同。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概论课程^④;同年,梅光迪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假课程中讲授文学概论^⑤。至此,西方文学理论全面而有系统地进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领域,而中国文论话语自然而然地就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全面介入中逐步完成其现代知识转型^⑥。

①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文集》(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2页。

② 《民国元年学科设置及课程安排》,北京大学档案馆藏,转引自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③ 旷新年:《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8页。

④ 傅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理论的发轫及检讨》,《文艺报》,2001年4月30日。

⑤ 详见古风:《从关键词看我国现代文论的发展》,《2001年中国年度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194页。

⑥ 参见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三

随着以西方“他者 (the other)”为参照的学科建制的确立,传统之“文学”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literature)”渐渐发生了转换。如果说传统的“文学”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实乃一种经学教育,那么在新的学科建制中,传统之“文学”便从对经学束缚的摆脱逐步发展到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literature)”。在此过程中,西方的知识学背景固然以一种其特有的知识分类形式直接表现在知识谱系上,然而其背靠的支撑应该说是来自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是西方特有的知识理念,另一方面也得到与其相适应的学术体制的支持,具体在知识分类上就是现代学科建制的确立。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与“文论”之所以与传统的“文学”、“文论”迥然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于自晚清—五四以来所确立的学科建制基础上的现代学科意识。在此框架意识里,传统“文学”与“文论”的观念及话语在被抽去其文化精神支撑后,主要是以西学的文学理念及知识分类来进行重新建构。

随着新的学科建制的出现,来自西方的知识分类法便将承载中国传统知识话语的经史子集彻底瓦解了,并且以西学的文化文学知识来切换中国传统的知识话语,从而使本就走向衰落的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话语走向彻底的失落。在晚清—五四语境中,知识系统的重建,究其实质,就是来自于西学的学科建制对中国传统知识系统进行重新切割与组合。当时盛极一时的对国外百科辞书的翻译,可以说就是这种知识重组最具代表性的体现。这些翻译的辞书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很多中国传统文人正是通过这些辞书得以对西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开始服膺西学。具体而言,其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使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比较了解西方文明内容和程度,在目迷五色之间,有点概念的参照系。2,改善和提高中华民族自身的知识内容,尤其是大幅度增加传统所缺乏的内容。这是整个知识传统体系的大变革,表现出来就是出国热、出书热、新名词漫天飞舞、反传统行为比比皆是等。当时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球、人类、国家、科学等知识,给予极大的注意,外国百科辞书所提供的知识准确度,是明显高于中国传统所能理解和表达的。3,改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外国新专门知识结构和整体知识间的关系,在外国百科辞书中潜在着,中国人一拿来学习,就能够发现其优点,能够很容易拿过来用。中国传统习惯用的学习思维方法,面对新知识就不够用,例如特别缺乏逻辑系统思考、固定前提的‘天’或‘道’,在新知识面前完全无能为力。至于外国辞书所用的参照系、标点符号、图表等,也明显提示中国人去学习、实行。还包括书籍出版从石印改进到铅印,线装改进到平装、精

装等。4, 这些外国百科辞书的翻译出版, 对于中文和外文概念对应, 以及翻译要求, 是中国自秦始皇‘书同文’以来, 又一次新要求, 即要求同国际通用语文来个‘接轨’。”^①

另外, 随着以西方为参照的学科建制基础上现代教育体制的形成, 大量新式学堂得以建立。无数中国青年开始走进中国传统社会里从未出现过的新式学堂, 接受新学。这样一来, 无疑就需要大量新的教科书。“到 1903 年前后, 书院教育终于被新式大中小学教育所取代。新式学堂出现之后, 教科书的编纂成为当务之急, 于是南洋公学、文益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先后出版适应时代需要, 而且销量巨大的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但‘所有大学教本, 向来惟外国文字之出版物是赖, 学子了解终不如本国文字之便利’。”^②

需要指出的是, 具体到与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直接相关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 则是在稍晚的时候^③, 却与从晚清一五四时期就开始的新的学科建制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现代教育体制密切相关。

总体而言, 晚清一五四语境中学科建制的确立不仅在知识分类上通过中西知识谱系的切换开启了中国文论话语的知识转型, 而且也通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教育体制为传统与现代之交的新一代中国文人提供了一个外在与内在都能得到寄托的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从而开启了中国现代文论话语主体的现代性自我型塑。当然, 这种转型与自我型塑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 不仅有中西知识谱系的切换, 也有种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异与搏斗。在晚清一五四语境中, 随着人们对西洋实用学问的服膺和效仿, 中国文人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西洋学问的制度, 他们相信“欧洲各国日趋富强, 推求其源, 皆学问考核之功”^④。可以说, 当经、史、子、集的传统知识分类法在晚清一五四语境的学科建制中转化为文、史、哲、政、经、法以及数、理、化等西方学科的分类法时, 西学知识谱系便以一种全新的学科分类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进行了彻底的重组, 而这正是中国文论话语知识转型的学术基础。

(作者单位: 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

① 钟少华:《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13 页。

② 王建辉:《文化的商务》,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第 114 页。

③ 详见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文学理论教材与教学的历史沿革》,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④ 详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第二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606-607 页。